

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与中国

钱林森

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法国 20 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被称为“伟大的旅行者”和“世界公民”式的作家，以跨文化创造特色而蜚声法国和世界文坛，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旅行—写作”的跨文化创造历程——勒克莱齐奥于 1940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先祖为法裔非洲毛里求斯人，父亲是英国军医，母亲是法国人，都来自毛里求斯岛，在他身上自然流淌着多种文化交融的血液。8 岁那年，小勒克莱齐奥离开尼斯，跟随母亲前往尼日利亚，寻找二战后在那里行医的父亲。在漫长的旅途中，他开始首次创作试练，由此而踏上了“旅行——写作”的生命途程。1950 年，他从非洲回到法国完成中学学业，在法国南方尼斯、艾克斯普罗旺斯学习文学。之后又去英国伦敦、布里斯托尔学习英文。1963 年在尼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这一年，他刚刚 23 岁，便以处女作《诉讼笔录》（*Le procès-verbal*）荣膺有影响的勒诺多文学奖，而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翌年，他以诗人亨利·米修为硕士论文选题，在艾克斯-昂-普罗旺斯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便“远游——创作”，齐头并发，一发而不可收，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自 1963—1975 年间声名鹊起的初始阶段，勒克莱齐奥就自觉地跨出欧洲文化圈，周游世界，放眼多元文化，他先后去过曼谷、墨西哥城、巴拿马、波斯顿等地，足迹所至，遍及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的文化，他和这些不同族类的文明相亲相拥，名副其实地成了“各大洲文化的儿子”。他潜心研究过墨西哥、巴拿马文明和印第安人玛雅文化，1970—1974 年，在印度修士恩贝拉和沃那那斯的指引下，勒克莱齐奥前往巴拿马一个印第安土著部落，全身心地和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融入他们的魔幻文化，进行精神静修，长达四年之久，这一文化历险，对他后来的创作，无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稍后，他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大学通过墨西哥历史文化的论文答辩而获得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著。1975 年，他与来自撒哈拉沙漠游牧部族的第二任夫人成婚，并在后者的引领下走进西非的沙漠文化，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生活视野，

1980年，创作出最具突破性的小说《沙漠》，为他赢得了法兰西学院所颁发的保罗·莫朗文学大奖。1990年代后，他每年来往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开尔克、非洲的毛里求斯岛和法国的尼斯、巴黎，易地生活、创作。从2000年起，他开始对东亚文化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多次出行到韩国，探访名川古迹，追寻东亚文明。就这样，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和文学游牧人，行行重行行，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写作，笔耕不辍，迄今为止，已创造出包括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故事，以及译作、专著在内的四十多部作品。他的这些创作构成了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成果，深得法国读者的喜爱，并由此而被推向世界文学的高峰。1994年，法国《读书》杂志举办“最喜爱的作家”读者调查中，勒克莱齐奥被选为在世的最受欢迎的法语作家，他和莫迪亚诺（1945—）、佩雷克（1944—）一起并称为“法兰西三星”。2008年，瑞典学院的评委们毫不犹豫地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勒克莱齐奥，是名之实归的。

勒克莱齐奥步入文坛之际，正值上世纪60年代法国“新小说”方兴未艾、文学处于“怀疑”、“探索”的时代，横空出世的《诉讼笔录》和年少成名的作者，自然难以脱离这“怀疑”、“探索”的世风。凡是读过他这部成名之作的读者，都不难从中看到“新小说”的影子，由此而开启的前期创作，大多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然而，勒克莱齐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作家，他的创作总是和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特异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多元文化身世、世界性的文化历险、漂泊不定的行旅生涯与生活方式，使之始终游离于集团、流派及时尚前卫的边缘，而造就成自己卓而不群的风格特色。他的作品，不论早期的《诉讼笔录》、《战争》，还是后期的《沙漠》、《寻金者》等等，多以边缘世界为背景，以漂泊流浪的边缘人物为主角，或表现其思想和行为的边缘，或突出文化和地缘的边缘，概莫例外，从而凸显出作者对人类弱势文化和濒临消逝的远古文明的关注、对居主导地位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质疑和厌弃，以及对寻根、回归原初本真的向往与期盼，充分体现出他对人性、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瑞典学院称勒克莱齐奥是“一位不断超越创新、诗意冒险和感官迷醉的作家，一位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探求者。”应当说，是把握到了他的创作特质的。

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接受—— 上世纪60年代初，初登文坛、弱冠成名的勒克莱齐奥，曾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国，将之作为他的“东方之旅”的第一站。不料，与他所钟情的中国失之交臂，长久以来都成为这位永远的行者之

“一大遗憾”¹。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趋向丰产和成熟，正值中国知识界思想大解放，迎来外国文学二次涌流之际，我国学界，在引进外国文学的潮涌中，也将目光投到了这位风格独特的法国“另类”小说家，开启了与作者创作同步进行的介绍与接受。最先翻译到中国来的作品，是勒克莱齐奥198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沙漠》（*Désert*），中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钱林森、许钧译），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41000册。作者为其中文版寄语中国读者，这样热情地写道：

我十分荣幸、十分喜悦地获悉，我的《沙漠的女儿》一书多亏钱林森、许钧先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对我来说，中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经历是个典范。《沙漠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个英勇斗争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励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与殖民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进行了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当今西方世界与不公正和贫困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孤立斗争。他们的斗争绝不会是无益的。我从游牧人首领玛·埃尔·阿依尼纳和年轻的移民姑娘拉拉那儿吸取了我无法表达的力量。我希望中国读者原谅我，接受这部不完善的作品，它远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一种感情的交流。

您们的诚挚的朋友

勒克莱齐奥

1982年7月，尼斯

这是勒克莱齐奥首次和中国译者、读者书面交流的文字，弥足珍贵。译者在译文序中简要地介绍了作者生平创作，并从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的角度，推崇该小说通过女主角拉拉等流浪者的行踪和目光，一方面，“把大沙漠的荒凉和苦难与资本主义都市的黑暗与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另一方面，“把阿拉伯人民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与殖民统治的血腥镇压加以比照，两条线索或平行或交叉，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显示出作者构思谋篇的功力和匠心。”在表现手法上，“不以情节波澜叠出取胜，而以描写细致、真切见长。”认为：“跟作者以前的小说相比，《沙漠的女儿》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开拓，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使他毫无愧色地跻身于法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²这可能是我国学者评论勒

¹ 参见余中先《勒克莱齐奥印象》，《译林》2008年第6期第184页。

² 勒克莱齐奥《沙漠的女儿》中译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克莱齐奥的第一篇文章。1983年12月，笔者有幸在巴黎与勒克莱齐奥晤面，就他在中国出版不久的《沙漠的女儿》中译本，和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巴黎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集《北京市民》（Gens de Pékin, 1982, Paris）法译版，进行了交谈和对话，相聚甚欢。可惜，后来因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这个交流和对话没有能再延续下去，他的首部中译小说，也被当年我国引介外国文学的波澜壮阔的大潮所淹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去年作者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后，才又被学界忆起，出现了郭宏安有深入研究的论文³。

自《沙漠的女儿》首译本，中国读者差不多等了近十年，才读到勒克莱齐奥的汉译作品，先是刊载在《世界文学》（1991年第2期）上的五个短篇小说《蛊惑》、《时光永驻》、《雨季》、《齐娜》、《曙光别墅》，再是长篇《诉讼笔录》（许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一版，2008年二版）和短篇小说集《梦多和其他故事》（中译本题为《少年心事》，金龙格译，1992年，漓江出版社），两书皆列入权威批评家柳鸣九所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并由柳先生亲自赐序，标示着我国文学界对勒克莱齐奥的介绍和接受已走上了自觉发展的阶段。柳鸣九在序文中对两部作品的思想艺术进行了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明确地将勒克莱齐奥界定为20世纪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与著名的米歇尔·图尔尼埃、莫狄阿诺并称“新寓言派”的“三杰”。柳先生不止一次、不止一处强调，所谓“新寓言派”，已“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只不过是“指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⁴。顾名思义，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与相似的特点，“就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在自己的作品中贯注一定的哲理与寓言，甚至有时是从某种哲理与寓意出发而建构出自己的作品”。他们间的一种相同倾向，是“对现代人生活的反思与忧虑以及对某些人文价值的理想与追求”，“新寓言派”中不少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哲理寓意之一，颇有卢梭主义余绪的气息。”⁵具体论及到勒克莱齐奥上述两部作品，柳鸣九认为，《诉讼笔录》是作者精心构制的一部“骇世惊俗”的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亚当·波洛的原始化、非人化和物化的揭示与描述，赋予这个臆造出来的“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以奇特的怪异性，使之成为作者本人所寓意的形象载体：其中“原始化”，显然是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传统，“非人化”隐含着圣经中对伊甸园那纯净世界的理想，即生态平衡的理想，而“物化”则颇有我国古哲“万物与我为一”的哲理味道。柳鸣九指出，所有这些哲理寓意，构成了这部小说“对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异

³ 郭宏安《〈沙漠〉：悲剧·诗·寓言》，《书城》，2009年1月号。

⁴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序》第7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

⁵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第334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

化的全面揭示”，集中表达了作者“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极端厌弃”，是一部“发人深思”的“另类”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初露头角的勒克莱齐奥在该作中，几乎汇集了那些反传统的先行者，如“新小说”、荒诞派、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所有“实验”，而又善于超越，致使这部“骇世惊俗”的小说，“成为这位‘新寓言’派的主要人物的代表作之一”⁶。而《少年心事》在柳鸣九看来，则是勒克莱齐奥再现卢梭风致难得的佳构，论者以诗意的笔致，细致地解析了作者笔下一群少年浪游者所体现的卢梭式的精神意蕴，指出，在这些崇尚自然、本性，追求自由、洒脱的漫游者形象背后，“是作者一颗痛感现代生活的缺陷而焦虑地关心着人的本性之复归、关心着人对现实条件之超脱的心灵。正是在这个意蕴上，这些短篇与作者的成名作《诉讼笔录》中那个偏执地要实践人性复归的流浪人亚当·波洛是相通的。”⁷这是切合原著真髓的精当之论，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接受者最高水准。

随着勒克莱齐奥一些作品相继介绍到中国，便直接推动了作者和译者的直面交流和对话，而作者和译者的对话和交流，又进一步促进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1992年秋，勒克莱齐奥携夫人来到中国，在法国大使陪同下，前来南京参观访问，会见了主要译者许钧教授，他对后者说：“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⁸对中国译者如此尊重、信任，使许钧受到鼓舞。自此，勒克莱齐奥每有新作问世，会在第一时间寄给许钧，而许钧教授阅读后，便带领自己的弟子翻译，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于是，我们就读到了作者著名的《战争》（李焰明、袁筱一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一版，2008年再版）和《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中文译作，新世纪之初，我们又先后读到了他另外两部长篇《金鱼》（郭玉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乌拉尼亚》（紫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和台湾用繁体字翻译出版的《他方》（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短篇《偶遇》（蓝汉杰、蔡孟贞译，皇冠，2006年）、《金鱼》（邱瑞奎译，皇冠，2008年）等汉译文本，译介者的努力，推进了勒克莱齐奥在中国海峡两岸广泛传播，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作均附有译介者或作者亲笔撰写的译序、后记或导读、寄语，或阐明创作主旨，或解析作品特色，内中不乏有思考、有眼光的评论文字，如许钧提供的《战争》译序和袁筱一写的《流浪的星星》译序。《战争》延续了勒克莱齐奥成名作《诉讼笔录》所开创的关注现代文明的种种诟病、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主题和笔法，是作者早期现代性极强的作品，要使这部屏弃了传统小说几乎所有构件，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作品，为普通读者所理解

⁶ 见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第344-353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

⁷ 见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第357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

⁸ 许钧《我和勒克莱齐奥》，载勒克莱齐奥《战争》中译版前言，第3—4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

和接受，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这部写“战争”的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根源何在？它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表达的是何种寓意？读者若要读懂它的内涵，听清其中的呼声，是该“用脑”还是该“用心”？所有这一切，均由论者在序文中向读者娓娓道来，是一篇别致而有趣、颇费心力的导读。《流浪的星星》，写的是犹太女孩艾斯苔尔和阿拉伯女孩蔡玛寻找、回归自己家园的故事，小说如泣如诉地展示了这两个不同族类的弱小生命之悲剧命运，是作者文风转换后的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堪称“笔酣墨饱”的成熟之作，它是作者所深爱的一部书，也是女译者袁筱一教授“真心喜欢过的一本书”。作为译界极有天赋的女译手，她在译、评点这部小说时，不仅以女性敏感温柔的心灵，身同感受，体悟到了作者笔下这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及她们的“绝望和疼痛”，并用简洁、透明、优美的汉语，“参与作者的创作”，一一加以移植过来，呈现于我国广大读者之前，更以女性的才情和细腻，将对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的领悟和理解，从审美角度，一一加以揭示出来，供读者品尝。在她看来，《流浪的星星》这部小说，通过两个女主角寻找家园的流浪途中所遭际的等待、希望、绝望、死亡和宗教期许的描述，表达的依然是作者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作者选择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的主视角，故事情节都是以“她们的所见、所感、所触和所想而展开的。”在视角上和时间内，采用了平行不悖或交替对称的手法，伴之以一种“俭约、凝练、朴素却不乏优雅之美”的经典语言和技巧，一部小说“隐隐的忧虑、伤痕、无奈和绝望被包裹在一个精巧、冷峻、智慧而简洁的套子里，让人无从拒绝。”⁹稍后，袁筱一在其《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的专著中，更把勒克莱齐奥提到与萨特、加缪、波伏瓦、杜拉斯、阿兰·罗布-格里耶、米兰·昆德拉等比肩而立的地位，对他的思想艺术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的剖析和评价，文情并茂，思辩深邃，大有前辈李健吾、柳鸣九的笔力。这些有真情实感的译述和独立思考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勒克莱齐奥其人其文，从而逐步走近这位跨文化写手的文学世界。不少读过《流浪的星星》、《少年心事》等汉译之作的读者，便一下被“迷住”，“觉得冲撞到自己的灵魂”，爱不释手，以至连读五遍而手抄文本，甚或以女主角艾斯苔尔的名字而自诩¹⁰，这种“痴迷”的接受与影响效果，显然与译者“参与作者创作”分不开的。至作者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更成了我国学界和圈内圈外读者“热议”的对象，在报刊上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有相当分量的评论文章，由此而将勒克莱齐奥的传播和接受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⁹ 袁筱一《流浪的星星》中译序，第1—11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

¹⁰ 据天津日报 常跃强，又见：涂涂《私人日记——那一颗流浪的星星》，新京报，2008年10月20日。

那么，这一时期中国接受者（译者、研究者和读者）究竟怎样认识、理解勒克莱齐奥这位“另类”作家的创造，从而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呢？——

在他们眼里，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真正的流浪者”，一个为数不多的“在流浪的过程中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家”，且回到“自己家”的人¹¹，是一个远离尘嚣，始终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始终坚守对人性、对人的精神、对人类命运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不平凡的“行者——作者”，他的出现正适逢其时。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大众喧嚣的社会，我们需要有一颗能够静下来的心，需要一个能远离市场，对人的精神进行思考的人。”“而这四十年来，他坚决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他是一种社会的良心，或者说是群体的一种灵魂。”就这样，他从描述流浪汉边缘生活的处女作《诉讼笔录》开始流浪，在大地上，在内心里和文字中，一路走来，“用文字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了这个家”，四十个春与秋，“他没有一天浮躁，每年都有好作品问世，每一部作品都不错，他是很少和市场有‘瓜葛’的人。”¹²

他们认为，这位浪迹四方的作家是抒写“新童话”的“魔法师”，他的为人文，本身就“像一个成功遁世的童话：遁世、却能够直面这个物质世界的现实——当然，是用文字的方式。”文字在他那里，不是炫耀于象牙塔里的手杖，拒绝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书写新童话的工具，建造另一个真实的工具，“在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用一种优雅的方式慢慢地向后退去，直至退进神秘、悠远、美丽和充满力量的远古神话。”¹³他“不是奢望靠文字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靠文字乌托邦来抵抗这个世界”。¹⁴如果“真实”可以是一种构建，“童话就是它的外衣，它的居所。勒克莱齐奥所创建的世界，就是用美丽的词语盖了一座与现实隔离的透明屋子，在现实的存在废墟之中，它是那么耀眼，给每一个相信文字力量的人以安慰和避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对于小说的定义，真的相信好的小说家都是魔法师，好的小说都是寓言性的小说。勒克莱齐奥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这样，作为个体的故事，一切显得匪夷所思，然而，作为人类命运的探索，一切却又令人胆战心惊。”¹⁵

他们说：“勒克莱齐奥是位说故事的高手，读者经常可以在他的小说中，嗅到孤独、沉默、漂流的气息，看到人类对探求生命源头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强烈欲望及坚毅力量”。如同我们在《偶遇》、《金鱼》中，在《沙漠的女儿》、《少年心事》中所看到的“那种无声而坚毅的力量”，它们皆探讨着相同的主题：“关于磨练，关于邪恶，也关于自然之爱。给读者的感动也是在阅读中不动声色地慢慢累

¹¹ 袁筱一《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第1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¹² 许钧答记者问，据邓丽、高凌伟《隐居者：勒克莱齐奥》，21世纪网，2008年10月11日。

¹³ 袁筱一《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第1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¹⁴ 袁晓一《勒克莱齐奥：跨越通向乌托邦的门槛》，东方早报，读书网，2008年10月21日。

¹⁵ 袁筱一《从翻译勒克莱齐奥开始》，新民晚报，2008年10月27日。

积，不喧哗、不华丽，但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道。不单是精彩的冒险故事，而是诉说着‘追寻与探索’的成长过程。”¹⁶处处细腻地呈现出人性美，令人难以掩卷。

他们体察到，勒克莱齐奥是长于表现文化断裂和诗意遭遇的巨匠和见证者，他成熟时期的小说，多为融“悲剧、诗、寓言”为一体的佳作（如《沙漠的女儿》）。不过，他所描写的“断裂”、“遭遇”或故事，“并没有曲折、惊险之处，作者不过是叙述和见证一个事实，一个细节丰盈而饱满的事实。”因此，读者阅读这样的小说，“要有一个平和、安静的心态，跟着字句慢慢地进入一个浅斟低唱的叙述状态，取忘我、收纳、参与、认同的态度，屏弃语言和概念，进入与事物直接接触的境地。这样你不但不会觉得它的描写冗长枯燥，反而会浮躁暴戾之气得到了平复和净化，任由想象力带你驰骋翱翔。”¹⁷这种体察，确实把捉到了勒克莱齐奥小说美学特质。

勒克莱齐奥在中国二十五年“慢热”的流布中，始终以严肃的文学追求和人文、人性坚守而受到我国读书界的欢迎。这位被称为多元文化之子的作者，在中国接受者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却依然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化境遇中的现代作家”，¹⁸在精神追求上，他“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生灵，关注他们的命运，这正是我国有识见的翻译家将之举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理由之一¹⁹。勒克莱齐奥传入中国，对我国接受者的影响是缓慢的，也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和文字，曾令我国译界和批评界的才俊之士心仪、折服，以至使他们的创造和才思产生着生命的蜕变：“我真正的翻译生涯是从勒克莱齐奥开始的。他为我奠定了一种翻译的方式：无条件地走近一个人，为他的文字力量所俘获，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字交付给他——并且，这个交付的过程需要相当的努力。而对于我来说，交付出自己的文字，也许就是交付出了人生的大半。”²⁰“施与者”的惠予和启迪，使“接受者”不能不发自内心的激赏和感激：“人类的名誉，‘人类的境遇’（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小说的题目）——感谢法国文学，感谢像勒克莱齐奥这样的法国作家，以他们的世界视野与人文情怀，以他们有时被人嘲讽、有时被人滥用的‘浪漫’，关注着六角形的法兰西土地之外的无垠世界，关注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以外生活着、伸展着的各色人群。”²¹去年，勒克莱齐奥的一部描写美丽的远古神话之作《乌拉尼亚》，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

¹⁶ 《偶遇》中译介绍，台湾皇冠，2006年。

¹⁷ 郭宏安《〈沙漠〉：悲剧·诗·寓言》，《书城》2009年1月号，第79页。

¹⁸ 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读书》第100页，2009年第1期。

¹⁹ 许钧《我和勒克莱齐奥》，载勒克莱齐奥《战争》中译版前言，第5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

²⁰ 袁筱一《从翻译勒克莱齐奥开始》，新民晚报，2008年10月27日。

²¹ 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读书》第104页，2009年第1期。

外国小说奖”（2006年度），更受到了专家委员会的一致推崇，集中体现了中国学界对这位作家的总体评价和整体接受，如此，“中国的评审，世界的目光”，将他推进到经典文学的殿堂，推向了东方和世界文学的殿堂。

勒克莱齐奥之中国文化“情结”和可能存在的比较研究——2008年初，勒克莱齐奥风尘仆仆，前来北京接受由人文社颁发的2006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中国接受者的厚爱，使之深受感动，他说：“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我的小说《乌拉尼亚》，也感谢他们给我的这个荣誉。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很高兴，因为小说的出版和这个奖项的颁发让我能再次有机会来到中国。”²²这大约是这位“游牧作家”第三次来中国，可却是在中国圈内高层接受群面前首次露面，他的不事张扬的出场，留给中国文学界最深刻的印象，依然是脱不掉的落拓不羁的远行者的风致，亲切而可爱：“他穿了一身西服，有点皱，可能是旅途劳顿没来得及打理，人很清瘦，很精神，一双丹凤眼显得很冷静很深邃，仿佛有一种洞穿生命的力量。最让人称奇的是，他脚下居然穿着一双凉鞋！要知道，当时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呢！”²³——人文社一位编辑这样回忆道。于是，他在中国文界如此登台亮相，便传为佳话，成为当代中法文学关系中的一个盛事。

事实上，勒克莱齐奥自青年时代初登文坛时，便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情有独钟，他在此次北京之行获奖答谢感言中，向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结缘”的历程：

那是在1967年，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努力下，中法两国当时已经恢复了中断了十几年的外交关系，当时我还是一个应招入伍的新兵，履行着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出于个人的原因，也同时有点理想化，我本希望能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于是我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框架协议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插的古老的版画一样。当然，我对现代的中国一无所知，但是，我买了一本汉法词典，还有一本中国书法的教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于是我只好服兵役期间去曼谷的坦马查大学。这件事长久以来都是我的一大遗憾。但我却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

²²任文策《勒克莱齐奥的中国情结》，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0月22日。

²³转引自萧平《勒克莱齐奥：进行一场对世界的‘战争’》，《文学报》，2008年10月16日。

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北京小说家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的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²⁴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所怀抱的纯真而深厚的“情结”。我们知道，勒克莱齐奥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涌现出来的大作家，和法国同时代左派知识者一样，他“对毛泽东、对长征的看法，是一种传奇式、史诗般的理解”，²⁵对革命中国充满理想化的想象和热情。因此，当这位少年成名的法国文坛新秀，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的生命航程时，便自然首选了中国。与中国失之交臂后，虽然不无遗憾，但他仍坚持这一选择，“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由此见出，他不同于法国某些一心追寻“革命中国”的同辈左派作家，注重于从政治层面接受中国，而始终关注“文化中国”、“人文中国”的择取和接受。形成这种差别、助成他对中国作文化选择的原因，除了与他多种文化的身世和经历密切相关外，也跟他在探索的旅程中，与前辈诗人亨利·米修和中国小说家老舍的相遇分不开。的确，中法这两位大作家对年轻的勒克莱齐奥走向中国，并最终与中国文化“结缘”，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米修是云游四方而钟情于东方和中国的大诗人，上世纪30年代初，曾游历过亚洲和中国，热爱中国思想、文化，特别喜爱中国的诗、画（水墨画）和戏剧（京剧），在其著名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散文诗中，他对中国的戏剧艺术、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其精髓熔铸到自己的诗、画创作中。至于他与华裔艺术家赵无极和诗人程抱一之间的相互交流提升，互识互惠，相得益彰，更是为世人所称道的中法文化交流史页的新篇章。亨利·米修的文化视野、艺术造诣和中国情结，深得勒克莱齐奥等一代人的崇拜，后者在步入文坛之时，就以米修为追随的偶像，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过，他曾以这位所心仪的诗人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对米修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我们看到，勒克莱齐奥后来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阅读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甚至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包括“对墨西哥原始艺术的喜爱”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米修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米修引领他走向中国的。

如果说，得益于前辈诗人米修的引领和启迪而使勒克莱齐奥投向东方，促成他作“文化中国”的选择，那么，在通往中国的道路上与小说家老舍相遇，

²⁴任文策《勒克莱齐奥的中国情结》，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0月22日。

²⁵董强《勒克莱齐奥：其人，其作品》，《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5日。

才真正开启了他与中国文化、文学层面的交流、碰撞，真正意义上开始他对“文化中国”的接受和择取。勒克莱齐奥与老舍相逢、对话，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此时的他已经在巴黎文坛驰骋有年，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融合”，日趋走向成熟，而老舍早已在60年代被“史无前例”的“文革”飓风吞没，含冤作古，他留下的著作，如《骆驼祥子》、《猫城记》、《正红旗下》、《四世同堂》及其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接二连三地被译介到法国和西方，两者的相逢、对话，自然是生者对逝者的造访和通过留存人间的文字对话。1982年，老舍的《断魂枪》、《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等九篇中短篇小说法译选集《北京市民》（*Gens de Pékin*, Gallimard, 1982），由法国研究老舍的权威专家保尔·巴迪和华裔著名翻译家李治华等译界高手联袂推出，在巴黎出版，受到莫泊桑故乡广大读者异乎寻常的欢迎，1983年，勒克莱齐奥在巴黎有影响的《解放报》（*Liberation*, 14 février 1983）上刊发了《老舍，北京人》（*Lao She, Un homme de Pékin*）一文，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中法两位心气相通的小说家首次对话。接着老舍长河小说《四世同堂》（*Quatre générations sous un même toit*）法文版在巴黎问世，勒克莱齐奥又以《师者，老舍》（*Professeur Le She*）为题为之赐序，向老舍致敬。勒克莱齐奥在这两篇文章中，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对老舍其人、其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解读，充分表现出他对老舍悲剧命运的真切理解和同情，对老舍艺术创造的深刻领悟和高度赞赏，并让我们从其眼里的老舍，转换视角互看，看到这两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说家，有着怎样相似的精神气度、相通的文化视野、相近的艺术和生命追求，由此而将“施予者”（老舍）和“接受者”（勒克莱齐奥）一起推向我们的视线，进入跨文化的文学观照与比较。

勒克莱齐奥与老舍相遇和对话，首先体现着两者对作家使命和创作旨趣上的认同，由此而可窥见他们在精神气度上的相通。阅读老舍小说，相遇老舍，让勒克莱齐奥确信：老舍远不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表现者”，是“替那些无权说话的人说话”的作家，老舍在“文革”中含冤弃世，“标志着创作当代中国最真实、最深刻的文学作品之一的终结。”²⁶由着这一认识引发出他对作家使命和创作意义的思考。何谓创作？为什么要创作？他说，“创作，就是要做到直言不讳地说出怀疑、混乱时代里人类生活的真相，就是要记下人类生活的足迹”，不只是为了见证，更是“为了完成一项行动，为了抨击这个正在进行自我毁灭战争的世界上的暴行”。“创作，就在于努力表达这种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真实和可怕的现实之间的联系。很少有人能够表达这一点。因为

²⁶ J. M. G. Le Clézio, *Lao She, Un homme de Pékin*, *Liberation*, 14 février 1983.

真实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要求以灼热的甚至是燃烧的眼光来看世界。”为此他认为：“作家仅仅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成为历史学家，这是很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他那个时代的行动者，通过自己的回忆，创造日常生活图景，替那些无权说话的人说话，老舍正属于这类作家之列。”²⁷由“师者”老舍创作和生命的启迪而引发的这些思考，一直伴随着勒克莱齐奥整个创作过程，直至他摘取诺奖后仍然坚持：“作家如同正在发生之事的某种见证人”，“写作是成为见证人的途径”，²⁸但“行动，是作家最渴望见到的。”用写作、文字、创造和梦想“介入现实，改变思想和心灵”，渴望“打开一片新世界”。²⁹只要对比一下勒克莱齐奥和老舍的小说，回顾一下他们的创造历程，我们就不难看到，贯串于其中的，就是这认同的创作使命和旨趣，在精神气度上是相通的。

观照勒克莱齐奥眼里的老舍，也让我们发现，这两位来自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境遇的小说大家，都是在各自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不疲倦的人性探索者，具有同样开放的文化视野，同样真切的人文情怀。他们都极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关注普通人、小人物、边缘人的命运，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人物，作为各自小说的主人公加以呈现：在勒克莱齐奥那里，是流浪者、小偷、逃犯、偷越国境者、行为“怪僻”的少年，无辜无助的少女；在老舍那里，是他的“北京人”，旧北京“市民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为世人所知的无名之辈”，如战败者、摊贩、人力车夫、拳击手、妓女、巡警。他们充满悲天悯人的感情，展示这些小人物的各种人生色相，描写他们的遭遇和命运，笔端每每流溢着切肤的痛和本能的爱：在勒克莱齐奥笔下，是对弱者、无辜者，“一种近乎天真的信赖，对孩子、女人、老人则给予无瑕、深沉的爱。”³⁰在老舍笔下，他“善于让我们跟他一起分享他的同情、他的不安，有时也分享他的谐趣”³¹，分享他对“北京人”、“他的‘北平’”的爱。

勒克莱齐奥阅读老舍，最为之动容和激赏的，是老舍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对他（指老舍—引者）来说，艺术是真实的表现，他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³²他读《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读《北京市民》中那些“充满忧郁的诙谐和激情的故事”，走进作者的文学世界，与小说家老舍相遇，一如走进当年老舍的“北平”，与老舍熟悉的“北京人”相遇：在那里，无论是在街巷为生计奔走的小巡警（《我这一辈子》）、老武师（《断魂枪》）、人力车夫，还是大院内被

²⁷ 同上。

²⁸ 勒克莱齐奥答瑞典诺贝尔官方网站主编亚当·史密斯问，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5日。

²⁹ 勒克莱齐奥出席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演说词，《文汇报读书周报》2008年12月26日。

³⁰ 多米尼克·多纳（Dominique Dona）《流浪的作家和迟来的荣誉》（缪伶超译），《费加罗报》2008年10月9日，《文汇报读书报》2008年11月7日。

³¹ J. M. G. Le Clézio, *Lao She, Un homme de Pékin*, Liberation, 14 février 1983

³² J. M. G. Le Clézio, *Lao She, Un homme de Pékin*, Liberation, 14 février 1983.

遗弃而惨死的妇女（《柳家大院》）、被迫卖淫而哭泣的少女（《月牙儿》），或是蜗居小羊圈胡同里那些惶惑、挣扎的男男女女（《四世同堂》）以及往昔的北平——那“阴沉、喧闹的街市”，那“大街上的趣味、味道、色彩及其日常礼节、音乐、希望、幻想、诡计，还有夏末雨过天晴的美妙时刻。城市上空一片蔚蓝，每个人都可以‘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³³——老北京所有这些人与物一进入老舍的笔底，便一一以本来的面貌，活脱脱地重现在人们面前，令人不能不为其真实的力量折服。勒克莱齐奥赞叹老舍小说卓绝的艺术表现力、赞叹老舍驾驭纯粹地道的北京语言的能力和书写北京生活记忆的能力，这使我们想到勒克莱齐奥本人写童年记忆、人类苦难记忆的创作取向，追求法语语言表达的规范、优美、纯净和对某些词语，如间奏曲、克里奥民歌、毛里求斯谜语的偏爱，表明这两位小说家在艺术臻于“至真”、“至美”的努力中有相似的追求。

作为接受者的勒克莱齐奥和施与者的老舍，指出他们写作使命和文学旨趣的精神向度相通，指出他们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关注弱小者命运的共同文化视野和人文精神，以及对艺术“至真”、“至美”的相似追求，也许还是表层、宽泛的比较，那么，倘若我们细读他们的文本，作深入的考察和追问，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接受与影响的新天地。比如，老舍《骆驼祥子》和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通过作品主人公（如祥子）漂流北京街头的遭遇和命运的描写，特别是由主人公的行止、目光和感受再现北京地理和人文风貌这一特点，曾得到包括勒克莱齐奥在内的西方接受者高度称道，老舍创作的这一特点，在勒克莱齐奥后期写流浪者生活的长篇小说《沙漠》、《流浪的星星》、《金鱼》等，得到了新的承继和发展，由作品中流浪的女主角拉拉、艾斯苔尔等探寻家园的行踪、视角、遭际、感受来展开西方主流文化、都市风貌和边缘文化、地缘风情的描写，并由此展开构思谋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再比如，在勒克莱齐奥某些小说的结构布局，重描写、重场景再现而不重情节，讲究章与章之间承前启后的衔接技法（如《乌拉尼亚》）等等，也似乎烙上了老舍和中国古典小说某种印记。他在阅读《四世同堂》时就称道这部小说“着重的是描写和情景，而不是情节”，是“老舍小说中最‘中国的’”，称赞老舍是“最有力、最真诚地表达过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东方与西方相遇的必要性的作家之一。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幻想和丰富与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现实主义和心理描写的相遇。”³⁴我们是否可以说，也是“师者”老舍的艺术追求和20世纪“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的相遇呢？他们的相遇和对话，不仅使我们对中法这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而且，伴随着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日益广泛的

³³ J. M. G. Le Clézio, *Professeur Lao She*, préface de *Su Shi T'ung T'ung-Quatre generations sous un même toit*

³⁴ 同上。

传播和被阅读，开辟出“勒克莱齐奥与中国”的新课题，比如：勒克莱齐奥笔下“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勒克莱齐奥创作与东方文明意象、勒克莱齐奥小说书写记忆³⁵等跨文化现代命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

³⁵参见傅正明《为了忘卻的記憶——談勒克萊齊奧的文學主題》明報月刊2008年11月號